

“农业芯片”卡脖子,中国种业酝酿怎样的变局?

力求用 10 年左右,打好种业翻身仗

“农业芯片”——种子的问题,在今年两会广受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障粮食安全要害是种子和耕地。多名代表委员提交了相关建议和议案。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打好种业翻身仗行动方案,力求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实现重大突破。

两会透露中国种业哪些新动向?

权威人士详解种子危机“危”在何处

唐仁健说,种子在“有没有、保生存”这个问题上,立足国内是能够满足的。比如,水稻、小麦两种最基本的口粮,就完全用的是自主选育品种。外资企业占我国种子市场份额只有 3%左右,进口种子占全国用种量只有 0.1%。

同时,他坦承在“好不好、高质量”方面的差距。比如,玉米、大豆单产水平还比较低,不到世界先进水平的 60%。蔬菜里的甜椒、耐储番茄等种子,从国外进口还比较多。另外生猪的饲料转化率、奶牛产奶量,都只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80%左右。还有白羽肉鸡祖代种鸡,主要也是靠进口。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副主委李云才扎根农村 10 余年,是“三农”提案“高产户”。去年全国两会,他曾建议打破种子垄断、技术垄断、资本垄断和市场价格垄断。今年,他带着《关于突破种源“卡脖子”技术打好种业翻身仗的提案》继续建言。

根据调研,他列举了种业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种源“卡脖子”。虽然在我国主要农作物中大部分种子为“自产”,但玉米、马

铃薯等种子部分依赖进口。高端品种的蔬菜种子以进口为主。品种同质化现象严重,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基因编辑技术原始专利大多被国外控制。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够。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收集不全、保存保护乏力、共享机制不畅。

——产业集中度低,多、小、散、弱格局未根本改观。科研与市场“两张皮”,存在科研与市场脱节、品种审定与市场严重脱节、院校企研究“各自为政”问题。

——种业管理跟不上。个别县市区种业管理处于无机构、无编制、无专人的“三无”状态,形成管理真空。人才流失严重。辛苦与薪酬不匹配,高校毕业生存在“不愿进、留不住”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主任李登海说,中国现在有持证种业企业 7200 多家,真正有原始创新能力的不多。有的种业企业把已推广的良种稍微改变一下性状,就当作新品种推广,造成市场上种子同质化育种现象严重。“刚推广一个新品种,马上就有仿制的。现在企业新品种投放市场,顾虑重重。”李登海说。

两会透露哪些变局突破口?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专门谈到“现代种业”,指出:建设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长期库、种质资源中期库圈,提升海南、甘肃、四川等国家级育种基地水平,建设黑龙江大豆等区域性育种制种基地。新建、改扩建国家畜禽和水产品种质

资源库、保种场(区)、基因库,推进国家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建设。

唐仁健透露了相关工作进展:目前畜禽种质资源库正在立项。此外,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已经开建。新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今年 9 月份将建好,建成后保存能力达到 150 万份,位居世界第一;在原创技术、底盘技术上尽可能突破;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抓好海南南繁基地和甘肃、四川等国家种子基地建设;管好种子市场,保护好知识产权,尤其要严厉打击套牌侵权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王国海说,随着支持种业发展的政策加快出台,更多种业科技成果将加速研发、转化,保护品种创新、规范品种同质化问题将成为种业发展的主题,国家种业创新体系将基本建立,一批种业“隐形冠军”将加快产生。

被誉为“南繁硅谷”的南繁基地引人注目。据了解,南繁基地依托海南独特的光热资源,能缩短农作物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育种周期。每年,全国 29 个省份的 700 多家农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种业企业的近 7000 多名科技人员赴南繁育种。全国已经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中,70%以上经过南繁基地的培育。

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副局长郭涛说,将依托规划建设的 6028 亩南繁科技城,打造全国种业创新基地。

打赢翻身仗还需重视哪些问题?

两会上,代表委员为打赢种业翻身仗积极献言献策。

宠物烘焙师、密室设计师……

新“零工时代”正在到来

“零工经济”时代正在到来。人们熟悉的外卖小哥,已经以“网约配送员”的名义成为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去年正式发布的新职业之一。而如今,“零工”的概念还在不断被丰富——主播、宠物烘焙师、密室设计师、汉服造型师、奶茶试喝员、外卖运营师、收纳师、创客指导员等新职业丰富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就业选择。一份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中,将这些强调即兴发挥、创造力和灵活响应的灵活就业称为“灵工”。

新“零工”只能吃“青春饭”?

5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支持各类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零工市场建设,广开就业门路,为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创造更多公平就业机会。”讲到这句话时,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正在让灵活就业方式从“就业备胎”变得“大有可为”。很多人的用工关系从“公司+员工”变成“平台+员工”,但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高小玫注意到,虽然灵活就业的概念在政府文件中已出现约 20 年,却至今未全面纳入劳动行政部门监管范围,劳动规范、劳动保障无法可依,因而也成为劳动纠纷的高发区。

也正因为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上海分公司邮件接发员柴闪闪特别留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上的这句话:继续对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并且推动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在他看来,这相当于给灵活就业者吃下了“定

心丸”。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说,据他的调研,目前我国约有两亿灵活就业者,其中很大一部分选择了依托互联网的新就业形态,包括电商物流、网络送餐、网约车、直播、网络文学、自媒体等。

在他看来这种新就业形态具有就业容量大、进出门槛低、灵活性强等特性,已成为全民就业的“蓄水池”与“缓冲器”。

年轻人是“零工经济”时代的主力军。据相关企业统计,滴滴平台的网约车司机平均年龄为 37 岁。外卖平台饿了么的骑手更为年轻,平均年龄是 31 岁,其中 90 后骑手占比达 47%,95 后骑手增长最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1.2 万名 00 后大学生开始兼职送外卖。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年轻人选择做直播、拍视频、设计密室……

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联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重点围绕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全媒体运营人员、网络文学写手、电子竞技员、新兴互联网科技从业人员、新型职业农民等 7 类新职业青年群体开展专题调研,形成《关于促进新职业青年成长发展的提案》(以下简称《提案》)。这份提案提到,年轻的新“零工”们,普遍面临群体诉求高度分化、社会保障覆盖不足、成长发展压力大、社会认同偏低等现实困境。另外,调研显示,近半数受访新职业青年认为未来 6 个月有可能失业,这个比例远高于全国在职青年 21.8%的比例。

马化腾认为,要帮助灵活就业者解决只能吃“青春饭”的问题。他建议拓宽灵活就业群体参与社会保障的渠道,完善灵活就业相关统计与综合考评机制,优化新就业形态的信息、认定、匹配服务,建立适应数字社会的终身学习和就业培训体系,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在线课程和就业指导服务,建设劳动者终身学习的“数字学堂”。

不能让新就业形态成为劳动者权益保护缺失的代名词

根据国内最大的致力于灵活用工服务和研究企业人瑞人才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联合调研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0 年,55.68%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与上一年的调研结果相比,使用灵活用工的企业在总体企业比例中提高了约 11 个百分点。

随着灵活就业的群体不断扩大,相关的制度保障显得更加重要。

根据高小玫的调研,平台企业利用其优势地位单方面变更计酬标准等,单一从业者无力对抗,平台劳动者明显处于劣势。目前绝大部分平台从业者未被社保“覆盖”。“平台用工的社保问题,终究要由国家社保制度予以解决。”

除此之外,高小玫还注意到,一些接单平台将配送业务外包,外包企业招募骑手,但并不在本公司为其注册,而是要骑手去某个平台上注册账号以备领取工资。但注册账号的同时,骑手也默认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然后外包公司或用工平台再与骑手签订劳务合同。但这样一来,关联链上的各

李云才建议,资金投入改变传统管理方式,实行揭榜管理流程和结果“回填”式管理,避免“各自为政”、资金分散的管理方式,提高科技研发能力。

此外,加大种质资源收集和保护力度。对濒临灭绝的优质地方品种进行抢救性挖掘和保护。学习先进种业的做法,注重挖掘有特异性的性状、基因,以丰富优异的种质资源和强大的基因库,为种业向质量型跨越创造技术和物质基础。

全国政协常委、中化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化工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表示,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原始创新保护力度有待加强,对跟随仿制性、模仿修饰性育种限制不够严格,部分地区、部分品种的种子市场中近似性品种泛滥。他建议,尽快修订种子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加大对违法侵权的执法力度,营造鼓励创新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李登海建议,要缓解种业企业科研人员流失现象。种业科研离不开领军人才、高效团队,虽然已经 72 岁了,但李登海还坚持在田地里做科研。他说,应该在职称评定、科研立项、成果评价等方面出台支持政策,鼓励更多科研人员投入种业科研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建议,建立濒危、地方品种育种保护区,农户种植特色地方品种农产品,政府支持地方品种申请地理标志保护,电商负责产销对接;设立专项,支持科研院所、种企、电商共建商业化育种中心,改良濒危、地方品种,电商以消费数据辅助良种选育项目决策,加速选育消费端喜爱、种植端高效的突破性新品种。

据新华社

个平台企业,与骑手都不存在劳动关系。一些平台用工模式通过“劳务化”演变为去劳动关系化。

对此,高小玫建议,应制定一系列平台用工合同示范文本,制订平台用工专项法规。尽快建立平台从业者专项社会保险,尽快建立平台从业者专项社会保险。

在团中央针对新职业青年的调研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朱迪发现,1/4 的新职业青年没有参加社会或商业保险,电子竞技员、网络主播和网络文学写手的社保覆盖率最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炫世唐门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张威从事网络写作多年,他发现很多网络文学写手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意识,这既需要国家层面补齐短板,也需要教育引导从业人员主动跟进社会保障措施。

广东省东莞市副市长、民革广东省委副主委黎军告诉记者,很多年轻人自己在家开网店、做直播,但没有注册企业实体,因此在参加社会保险、工伤保险的时候比较麻烦。另外,如果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跟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发生纠纷,用传统的方式也很难处理。她建议,应该尽快研究建立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机制、劳资纠纷处理规则。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认为,新就业形态正在不断改变工业经济主导的就业格局,对政府的就业政策提出了挑战。“我们或许不能以传统雇用模式来审视新就业形态,更不能让新就业形态成为劳动者权益保护缺失的代名词。”

据中新网